

景觀

單位美學

——「雙百工作室」三十年踐行記

● 劉大鴻

一 創建與低潮

三十年前的「八九學運」後，大學裏出現了兩種現象：一是出國熱加劇，年輕教師能走就走，近乎拼命，戲稱「勝利大逃亡」；二是低眉順眼，苟且度日，按部就班，含光混世。我是1985年於浙江美術學院（現稱中國美術學院）畢業、後來在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任教的助教，不認同上面兩種作派。當時我年輕氣盛，吃在學生食堂，住在教工集體宿舍筒子樓，就有個「直筒子脾氣」——一以貫之：一座城市，一個大學單位（上師大正是我踐行單位美學的地方，在此發明了一個「單位美學」的觀念），一輩子，把一件事幹到底。

最後一批學運活躍份子遭秋後算賬，被「解脫」的我與剛被撤掉上師大文學研究所所長職位的孫遜教授相識成友，串線人是藝術理論教師萬慶華。在1990年的某天，三人同行，探訪著名國畫家、上海道教協會副會長戴敦邦。我談及他描繪清末民初舊上海

的《新繪舊上海百多圖》（1989），聯想到當時的社會境況，當即就有了組織學生畫《新上海百多圖》（以下簡稱《百多圖》）的想法。這與我在那段沉悶肅殺時期尋找出路的願望吻合：做一點可做的、又是有意義的事情。

創建「雙百工作室」（以下簡稱「雙百」）的想法一閃念間就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徹底被否定了，但他這個「雙百」文藝方針一直沒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深入我心，這個名正言順的旗號理應當仁不讓（我對毛澤東的興趣至今沒減，可能是與生俱來，在2010年還買了他老人家的玉璽的仿真品，2013年也畫了青島嶗山惜福鎮的毛公山）。碰巧那時毛澤東熱又回潮，像是當年受壓的「紅小鬼」想念毛主席一樣，全社會有一股「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潮流湧動，「雙百」師出有名。

1991年秋，我在本科班帶領88級學生進行畢業創作，布置了第一批《百多圖》，請了頂頭上司、西畫教研室主任黃啟後（學運前我負責發展教

工黨員，他是我介紹入黨的第一人)助陣，他親眼目睹了有個學生試圖用畫「強姦」來抗拒《百多圖》。此後，黃啟後成了「雙百」堅定的盟友，他的太太、上海戲劇學院教師方方也是最早的支持者。第一批《百多圖》命題創作定味「鹹」，取「人人適應，處處需要」之意，於1992年5月完成，共十五個學生每人完成作品一幅。當時《上海師大報》副刊編輯、攝影家林路對此很感興趣，特地在當月25日的校報上刊出了一個整版報導，同時把《新上海百多圖》徵求意見稿中的一百個題目公布出來，一時激起了熱烈反響。當時我仍住在筒子樓裏，不少樓友議論紛紛，歷史系老師嚴耀中就喊道：「還有『鄉下田地多拋荒』……」

我把報導寄給《新民晚報》社，社長很有興趣，派美術部記者李堅來採訪。那是美術系周五例會的下午，全體教職員工聚於一室，記者來找我採訪「雙百」成果，是挺搶眼球的一件事。那時《新民晚報》在上海的影響力比今天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還強，全中國還沒有甚麼晚報。於是我的「不成熟」有了後果：平時不扎堆、與領導不「貼」、與同事不「鐵」、「自說自畫」等等，就被人狀告到上面，雜音一出，結果是沒有見報。可能我當時的野心大了一點，把教育改革理想、系主任和以後幾屆學子應當的努力方向，以及要與人文學院合作編輯成冊等都打了包宣揚出去，這就犯了忌。

「雙百」的開場鑼鼓還沒敲下去，與大學這個單位同室操戈的序幕卻已拉開，一場要開除我的「陰謀」以「改

革」名義開始了。1993年6月25日，美術系周五例會，我照例一以貫之地在畫開會記錄速寫，卻點起了單位的人的無名火(2019年春劍橋大學耶穌學院「一丹獎」開會現場，坐在我旁邊的院長看到我畫速寫竟跳起來叫好！還是內外有別啊！)。行政主管宣布下崗名單，有五位教工要自謀生路，我則因為時任名譽院長、國畫大師劉旦宅先生坐鎮「力排眾議」而保住了崗位。以往我都在大學東部上本科班高年級和畢業班的課，現因「縣官不如現管」，給「眨」到大學西部上專科班低年級的課。

「雙百」進入低潮期，命題創作辦不成了，「鹽」沒法撒了。即使是石膏靜物素描，我也力求擺出血性來，結果「靜物不靜」，來巡查的專業主管看出了我藏在靜物中的「殺機」，當堂咆哮叫停。葷菜吃不成就吃「素」的，於是我發明了「米格素描法」，讓石膏靜物素描與米字格書法發生勾連，西方造型藝術中的幾何觀念，繩之以中國書法的米字格，創新教學，來實現中西藝術同時開蒙，學生照樣很來勁，但打壓也在繼續。

1994年8月22日暑期，我和黃啟後在校內的畫室受到系主管的直接衝擊，他們把不用的課桌等雜物推進畫室，堆至屋頂，讓我無法入內。即使我提出「全買下來」也不同意——就是挑明了要「停下來」，不許畫。其間有激烈衝突，我只好告狀到劉旦宅先生處，貴人發話，「畫是不能停的」，保住了讓「雙百」得以繼續存在的「地盤」。

接下來便是單位來找我的「思想」問題：歌詠大會唱紅歌，我不參加，

他們以給參加者重賞每人五百大洋來「懲罰」我；向有關方面舉報我的畫作的問題，如老華僑投書告我，畫毛如畫唐太宗等，最後書記來與我專門談「波普」。好在社會轉型、藝術多義，不能定案。1996年，校院兩級領導班子變動，我又去歐洲遊歷半年，總算安生了一段日子。

1997年，我在首屆上海藝術博覽會上展出了油畫《學堂》，表達了我對這個大學單位的感覺，由於描繪的都是真人真事，刺激了一些人，眾怒之下，「雙百」的門被踢破。還是劉旦宅先生度量寬大，認為我把他畫成法海和尚也不差，無過放行。「雙百」繼續存活，我開始帶96級本科班。在哪個班上課，哪個班便自然成為「雙百」，這便是「雙百」的生源。現實是沒有人同意我辦「雙百」，也沒有任何經費和專門場地，至今如此。

二 發展與挫折

1998、1999年，隨着校院兩級領導班子不斷調整，漸漸形成對「雙百」有利的局面。「雙百」開始加大馬力運作，第二批命題創作開始布置，並於2000年5月31日在上師大美術樓展廳舉辦了《百多圖》展，自費出版了畫冊。劉旦宅、戴敦邦為此題字畫，《上海師大報》整版報導，社會反應很好，一些媒體公開報導。「雙百」乘勝追擊，於次年6月6日在上師大美術樓無形畫廊再次舉行《百多圖》展，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上海百多圖》中英文雙語畫冊，作品逾百幅，戴敦邦、陳丹青為之寫序。電

視、電台、報紙、雜誌等各路媒體廣泛介紹，專業雜誌《藝術世界》、《藝術家》、《現代藝術》等長文論述，形成了很大的氣場，《上海師大報》又是整版介紹。同年，此展還到香港大會堂、九龍牛棚「藝術公社」巡展。

這讓單位的人感到坐不住了，開始了針對我和「雙百」進行各種布局與「做局」，「雙百」生存出現了危機。2001年底，我們終於忍無可忍，我們「造反」了，這就是「六君子」集體辭職，我和黃啟後、韓巨良、瞿廣慈、向京、魏劭農五位同事向學校指出學院有問題，不解決便離職。當時校主要領導站在了我們一邊，派了正直的校黨委副書記蔣威宜來坐鎮，改組了院班子，我也由任職十六年的助教破格升為正教授、研究生導師。

2002年6月10日，《上海師大報》再次用整版報導「雙百」最新展覽「美教到家—美教方式」，提出「雙百美教方針」、「寶塔大綱」，並出版畫冊，再次重申「雙百」一貫的開門辦學思想，讓學生關心社會、觀察社會、表現社會。北京的SOHO現代城也舉辦了「劉大鴻和他的工作室」展。同年，央視《探索與發現》欄目請我主持拍攝了兩集有關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劉海粟任校長時期人體模特風波的紀錄片《照片背後的故事》。

2003年，「雙百」再一次遭受打壓，6月25日，為了減輕「雙百」的影響，美術學院正式下文，強行把我正在上課的02級油畫本科班劈成兩個班，並在教室中間築砌一堵牆。我和黃啟後等盟友連夜召集「雙百」學生上課，題為《我的夢》，由長城到柏林牆講了一通，最終集體完成

「破牆」行為。由於得到絕大多數同學的支持，分班的結果是大家還在一起上課，只是一個班多出兩位領課時費的同事。這個班從此被盯上，那是後話。

「雙百」繼續前行，開始了把中共一大、舊上海石庫門、新上海風情三合一的新課題。2005年12月11日至31日，「雙百」在上海新天地一號會館舉行了《百多圖》第五次系列展「新天地百多圖」，出版同名畫冊和相關產品。學校宣傳部門傾巢出動，爭相宣傳這個「雙百」定性為「酸」的課題，認為能在「上海時尚新地標」與中共一大舊址同台十分榮光。《上海師大報》出彩色整版報導，「雙百」的士氣也再次鼓了起來。

2006年4月26日，「雙百」與上海東方廣播電台和盧灣圖書館合辦了「陳村的文字/劉大鴻的『上海細節』/淳子的咖啡」沙龍展，作家淳子主持，陳村參加，村長為《百多圖》逐圖配文，之後女作家孔明珠也為《百多圖》配文，在世博年(2010)刊發於《財經》世博特刊。

「酸」盡「苦」來，2006年文革結束三十年之際，「雙百」認為文革乃民族之「黃連」，親嘗者「啞」，新生代「聾」，不知苦乃國之大患；聽身邊長輩講家史，借作品折射文革鏡像大有必要，於是辦了「鏡畫緣——新文革百多圖」展，邀請在文革中坐過牢的劉文忠先生來講親兄弟劉文輝之死，並結合一批文革特產(印有《毛語錄》的鏡子)，在東廊藝術做展覽。展前兩天被封，苦了畫廊和相關人員，只留下了文革語言風格的請柬和以「死刑判決書」作為前言的畫冊。

同年5月下旬，我在延安參加長征空間主辦的藝術教育座談會，介紹「雙百」實踐時，接到學生告急電話，說02級油畫本科畢業生的論文全部被學院判為不及格。因論文抄襲風氣極盛，為對抗「三假」(假論文、假答辯、假權威)，我讓學生寫四年總結：寫總結不但無法抄襲，還有益自身修為。畢業生郭聖良點評了學校教師和同學，被找到了「槍斃」藉口。我火速趕回學校後，「雙百」師生通力合作，給校領導發公開信，上網呼籲，驚動了媒體大量來訪：《新京報》深度採訪，《中國青年報》在「冰點」欄目報導，《社會科學報》整版評說，央視、中國教育電視台、《南方人物周刊》等雲集，成為當年高校十大新聞。宣傳部門奉旨封口，一些媒體臨時撤稿，如北京的《青年周末》等；上海媒體也大多閉口，《新民晚報》兩記者先是受託對「雙百」發微詞，後又發楊東平文章支持「雙百」。學校迫於輿論壓力和市領導的震怒，讓學生(除郭聖良外)全部過關，並撤了美術學院院長和書記的職。

「紅五月」過去後，「雙百」師生一行十多人在8月到水鄉金澤，入住在全身心恢復中國鄉村魅力的「新鄉紳」、上海青浦區小西門古民居建築群落的重建者之一胡項城的木屋，開始了為期三周的「黃盒子·青浦：中國空間裏的當代藝術」項目創作。展覽在9月6日開幕，「雙百」的作品名為《紅日子》——那是「雙百」成員同吃、同睡、同工作的日子。不少人認為那是最甜的一段生活，所以此課題也稱「甜」。「雙百」是上師大同吃最多的集體，學生也以此為榮；我若能

同單位的人多點「同吃」，「雙百」的阻力會小一點吧？

三 真實與藝術

2007年7月6日，「雙百」的又一命題「新點石齋畫報」（「辣」）在上海徐匯藝術館開展，出版了畫冊《新點石齋畫報——雙百工作室命題圖畫十五年》，鄭勝天先生為之作序，他認為：「大鴻這一批作品具有極其鮮明的時間性、新聞性和大眾性。它跨越了前衛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也跨越了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的界限。」參加師生四十多人，「雙百」請了上海文史專家薛理勇等學者，辦了學術研討會，我也在畫冊中寫了〈開門興學，潛心復舊〉一文，上海電視台拍了專題片。此展覽位於市中心淮海路，與法、美等國領事館相鄰。審查的文化局官員很仔細，館長緊張得汗流浹背，《良字不良》、《鐵嶺悲歌》、《新宇薪傳》等畫作遭撤。畫冊封存，宣傳降級，展出照常，這就是「辣」的命運。

2008年2月，「雙百」師生代表三人受英國藝術贊助人邀請前往英國交流，「雙百」在京的據點也接待了三批來訪遊學的工作室成員。「雙百廣交會」是「雙百」的特色，也是開門辦學的方式之一。讓學生見各路人，走出去、請進來。神父、道士、書呆子、詩人、瘋子、憨豆混在一起，同吃同樂，「雙百」多次包場看小劇場戲，與導演「短兵相接」，也是一招。

同年，「雙百」針對獨生嬌兒蠻纏脆弱、自閉無友等問題，開展了以畫會友的「新良友」課題，名為「淡」，

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用一年的時間，讓參加者與朋友交往，無朋友者要先交友，以打動好友甘做素描人體畫的模特，此為課程第一步；再將人體結合上海萬國建築，以油畫形式造朋友的肖像，同時把這一過程記錄下來作為畢業論文（這次論文評核沒找我事）；最後仿照上世紀的老《良友》畫報，由「雙百」學子自己編成《新良友》復刊號。課題成果於2009年5月4日青年節以「會友」的形式在無形畫廊展出，請「良友」們到現場看「草台班」的「社戲」，同屬「良友」的《東方早報》、《新民周刊》等來訪報導。在舉國和諧之時，「新良友」課題沒遇甚麼艱險，儘管《新良友》封面是張愛玲抱魯迅。只是學校宣傳部因兩年前的「論文事件」耿耿於懷，沒再整版報導。

2010年6月，「雙百」在北京798藝術區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舉辦了「我的大學（1990-2010）：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的大型文獻展，並舉行學術研討會，由左靖主編的同名文獻集也同時推出。其中我提出了「單位美學」：「單位美學」是在極其微妙的單位關係中體現出的藝術制衡能力，是實踐的美學，是有用的美學，不被任何理論所架空，甚至不需要思辨。簡言之，「單位美學」是一個置身於單位環境裏的人面對具體問題的具體對應方式的藝術，其原則是真實加藝術。多家專業媒體介紹了此展，深受此觀念吸引（2019年春，我在劍橋大學的李約瑟研究所圖書館專門講了此專題，引起海外學者的廣泛共鳴）。2010年10月，上師大美術學院雙年展出版教師作品集，我把又一幅表現單位真人真事的彩墨畫《後生可畏》

交了上去。與《學堂》那次風潮相反，沒人公開談此畫，靜悄悄只在底下私語。有驚？有喜？有「氣」？……此畫就這樣不動聲色地被編入公開出版的畫集。

自2010年12月起，「雙百」佔據了上師大美術樓中央透明大廳，開始舉行一場集展覽、公開課、「會友」、研討會於一體的馬拉松式「真人秀」。2011年3月，長期支持「雙百」的劉旦宅先生逝世，大廳掛出「雙百遇貴人師大有大師」挽聯，橫批「功德無量」。

2011年4月14日下午，《藝術世界》編輯部主任沈奇嵐博士來訪，看到透明大廳的「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牌子上，被人用黑色記號筆揮寫了「好狗不擋道」五個大字，當場拍照留存。次日，單位領導指揮工友連磨帶擦，抹掉此痕。「寫」與「擦」，都是我始料不及的，正如「雙百」從出生至今三十年來風起雲湧，讓我感到意外一樣。同樣的一幕是：2019年5月4日，「雙百」三十年，五四百年之際，我請上海戲劇學院的燈光專家給「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牌子設計了紅燈，「紅燈照我去戰鬥」：從義和團女性組織「紅燈照」到《紅燈記》(1965)再到「雙百紅燈」，有傳承、有紅色基因。然而，這樣的喜事卻也不能長存，因「用電安全」問題，今日已不見紅光。

四 餘論

走筆至此，我感到文章有點長了，後十年就不寫流水賬了，簡單提幾個有趣的專題吧。大學裏都有教學大綱，我不抓綱上課，如何協調各方

關係，比如模特工怎麼安排？畢竟也不能斷他們生路，於是乎《浪子回頭》(2015)來了；原來的男人體課變成擔心文革回潮、家國情懷主題的創作課，於是《自由引導人民》(2017)來了；原來的女人體課變成馬克思誕生二百年後的「群眾街頭抗爭」，自由女神變成了媽祖，於是《百鬼日行》(2019)來了，借神州大興造神運動之風，「雙百」三十周年於無形畫廊辦了集講座、行為、裝置、繪畫於一體的「群魔亂舞」展，名為「百鬼日行」；《黨八仙》(2019)來了，在「明八仙」、「暗八仙」基礎上，又來了「紅八仙」。6月26日，在紅燈還照耀着的「雙百大廳」，舉行了「雙百30年座談會」，八十五歲高齡的老道戴敦邦先生，已退休的老黨員教授黃啟後，「雙百」歷屆學子代表潘之、孟文西、李俊等到場發言，留英博士方小龍、留法碩士王陽都有書面發言，孫遜先生也在病中寄語。

同期我的個人生活作風又出現重大問題，超生——生了三個女兒，得到一紙處分，罰了幾多鈔票，砸掉了上師大「文明單位」的牌子。不過我也舉牌子，6月13日，美術學院開大會，我拿着「反對拆美術樓」的油彩字畫牌，繞場一周，單位同事紛紛以手機拍照，其中一張照片被工作室同事陳華新命名為《美院牛虻》，製成招貼畫式的傳單，作為「百鬼日行」展的前言，照片下方紅字標題是「踏石留印6.13」。

劉大鴻 上海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研究生導師。